

《今日苏联东欧》专辑



苏 共 二 十 七 大
参 考 资 料 选 译

1986 年 9 月

上海社会科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

苏联东欧研究所主办

今日苏联东欧

专 辑

1986年9月出版

编辑：《今日苏联东欧》编辑部

上海中山北路华东师大内

印刷：华东师大印刷厂

出版发行：本刊编辑部

订购处：上海华东师大内苏联东欧研究所

（银行帐号：上海普办华师大所 4789659）

上海市期刊登记证内089号 2-80

目 录

• 综 论 •

- 列宁和大转折战略 布尔拉茨基 (1)
 苏共二十七大关于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 《消息报》社论 (8)
 个人意见 叶夫图申科 (10)

• 国际关系 •

- 沿着共产主义的创造与和平道路前进 拉祖莫夫斯基 (14)
 苏共二十七大和战争与和平问题 萨纳科耶夫 (20)

• 经济、科技 •

- 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 索罗金 (30)
 科技进步专项综合纲要 扎明 (36)
 工程中心——苏联加速科技进步的新型组织 帕通 (41)
 科技进步的经济刺激 科日符尼科夫 (45)
 关心科技进步 普鲁托波波夫 (51)
 发展经济机制的新阶段 格维什阿尼 (57)
 完善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性质 戈罗杰茨基 (61)
 首要的任务是研究生产关系体系 卡普斯京 (65)
 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关系 布申娜 马利亚诺夫斯基 (67)
 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自主权 塔拉索夫 鲍依科 (70)
 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的计划与经济杠杆 (77)
 完善管理与经营方法 伊万琴科 (79)
 自筹资金——合理的经营方法 莫斯卡列科 (85)
 集体承包是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 巴塔林 (91)
 完善国民经济管理机构体系的标准 马摩托夫 (101)
 苏共二十七大关于当前党的农业政策 《消息报》社论 (107)
 苏共二十七大论劳动刺激因素 《消息报》社论 (109)

• 政治、社会、文教 •

- 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 伊林斯基 罗日科 (111)
 社会主义民主和自治 茨维克 (117)
 马列主义人民自治的思想和它的历史发展 布金科 (122)
 有关民主集中制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 察布里 (127)





苏共二十七大的方针	亚戈金 (133)
苏共二十大关于社会主义法制问题	《消息报》社论 (140)
苏共二十大论言行一致	《消息报》社论 (142)
苏共二十大论社会的公正性	《消息报》社论 (144)
苏共二十大论社会主义进取精神	《消息报》社论 (146)
苏共二十大论公开性	《消息报》社论 (148)
苏共二十大论提高苏维埃的作用	《消息报》社论 (150)
 • 外国的评论 •	
对未来负责——对苏共二十七大的几点想法	[匈]奥瓦里·米克洛什 (152)
二十大前西方报刊对戈尔巴乔夫的一些评论	(157)
戈尔巴乔夫开始苏联的改革进程	(160)
戈尔巴乔夫能将言语转化为行动吗?	(163)
苏联慢慢地恢复活力	(165)
戈尔巴乔夫的“加冕礼”	(167)
 • 资料 •	
国内有关苏共二十七大的文章、资料索引	(168)

列宁和大转折战略

[苏] 费·布尔拉茨基

《文学报》编者按：实现苏共二十七大所制定的大转折和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战略要从改变意识，放弃已经形成的思维和实践的老框框，从清楚地理解新任务开始。代表大会的材料以及党和苏维埃国家后来所作出的决定是这一途径的范例。这些材料和决定在苏联社会的所有领域正在确立真正的列宁的工作作风，给每个劳动集体、每个工作人员确定方向。

在给我们编辑部的大量来信中都全面支持党旨在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与此同时这些信件又说明人们想尽可能更深入地领会反映大转折战略的新思想的实质。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的概念、合作社的发展、家庭承包、始终一贯地实现列宁的经济核算、商品货币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自治的发展等这样一些理论问题特别感兴趣。

对这些问题的仔细研究是党的理论思想进步明显的证明，是整个社会提高水平的指标，它不仅提出，而且还可以在实践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更加复杂的和大规模的任务。但是，为了使这些思想成为物质力量，它们应当通过人们的意识使每个苏联劳动者正确理解和扎实地掌握，应当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行动的指南。

在弗·伊·列宁生日的前夕通过与我们时代相适应的列宁的建议与思想以及大转折的战略为中介来研究党的二十七大提出的原则是很迫切的。这个任务由《文学报》政治评论员费·布尔拉茨基的文章来完成，文章谈到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某些哲学与社会学问题。

现在，当党提出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特别重要的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的计划与列宁的遗训相衡量，重新深思他的思想、观点和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关于我们理想的建议。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写的最后的著作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这里指的首先是这样一些著作，如《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论粮食税》、《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论合作社》、《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今天使我们激动的、我们读者在自己信里提出的许多基本问题的回答。

当然，谁也没有想机械地把今天和昨天，把八十年代和二十年代相提并论。如今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达到了以前所无法幻想的高度。但是在一个方面比较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那时和现在国家都处在大转折时期。那时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现在则从粗放发展转到建筑在科学、技术、工艺最新成就基础上的集约化发展。

第一个问题：关于政治转折的艺术

列宁喜欢重复说，政治，这是科学和艺术。作为理论家列宁的智力优势增强了坚强的真正钢铁般意志和政治勇敢性。正是这一融合获得使同时代人叹服的特性——政治转折的伟大艺术。

列宁的政治活动充满了这类例子。二月革命后，党的许多领导人指望苏维埃中的左派力量长期合作，甚至号召支持临时政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四月提纲中坚决转向准备无产阶级革命；1917年6月—9月党内不少人只考虑如何把党从混乱中解救出来，列宁提出了夺取政权的口号，而布列斯特和约、二十年代新的经济政策……

我们想象一下那些年的情况；国内战争刚刚结束，经济濒于崩溃，贫困达到了真正闻所未闻的程度，精神堕落遍及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波及到无产阶级，对具有“战时共产主义”的特点的经济活动的严格规定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迫切任务，和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发生更大的矛盾。于是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接下去走什么道路？

党内以列宁为首的才智卓越的人感觉到照老路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和致命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简单的、对最广大群众显而易见的问题——关于粮食税开始开辟经济政策的新途径，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转到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无疑，这帮助了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指出，在经济生活中整顿秩序可以不另外搞，而是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不搞强制性劳动，而是依靠物质利益、高度责任性和人们的自觉纪律、不要忽视群众，而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

苏共二十七大创造性地运用列宁的政治转折的艺术，这首先意味着善于勇敢地正视现实生活的现实，现实地评价情势，然后坚决抛弃证明是不正确的方法和制订积极变革的明确的概念。最后，善于依靠真正热心于贯彻方针的人。

第二个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特征

列宁要求克服那时存在的反对粮食税和其他改革的势力强大的偏见，“社会主义和改革”这两个词的搭配本身在那时就给人以胡闹，以与科学共产主义原理本身相矛盾的某种东西的印象。

在列宁的时代允许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改革问题本身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革命者，这一清二楚，可是改革的支持者呢？！每个共产党员与改良主义斗争难道不是神圣的职责吗？

在《论黄金作用……》这篇文章中，列宁专门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的作用问题。一切问题在于列宁的反对者们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改良主义者和改革者。改良主义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还是修正主义者他们都反对工人阶级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而改革者是革命已经胜利，也就是经济和社会改革更深入和深远地推进革命的时候起作用的社会变革者。

列宁解释说，无产阶级胜利前，改良^①是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无产阶级即使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也还会产生一种新的内容。在原则上虽然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却已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这种变化只有根据

^① 俄语 Реформа 既可译作改革，也可译作改良。——译注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

可以说出不少于二十种那时实施的巨大的社会改革——从工业国有化、粮食税、农村合作化到学校改革。近年来，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在进行不同生活领域的社会改革，但迄今为止关于这种改革的可能性本身许多学者和实践家却常常是担心多于希望。

正象苏共中央向二十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有一种观点非常流行，那就是任何经济机制的改变，几乎都看作是从社会主义的原则后退。有鉴于此，报告中强调，完善管理的最高准则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所有体系一样，应当是社会经济的加速和社会主义的真正巩固。

这个准则在任何领域里都是适用的，无论是袖珍计算机还是糊口的粮食；无论是电影作品还是电视作品，不论什么地方劳动生产率、商品的质量和加速发展是读数的包罗万象的点。

戈尔巴乔夫在回答阿尔及利亚杂志《非洲革命》提问时指出，我们党的经济战略首先要求在科技进步最新成就的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改变投资政策的结构。与此同时，它要求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目的是使整个国民经济仿佛在自动调节制度中活跃地工作。

应当指出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进行的改革至少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改革管理机制；第二种，改革生产关系的结构。显然，这第二种方案是最重要的，但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在于要把物质和精神珍品的生产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置于新的劳动条件和它的鼓励之下。正是这决定事业，帮助加速发展。

现在在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结构改革的根本特点是由以下情况所决定的，即改革是在城乡公有制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也就是在集体基础上进行的。改革是由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所激起的，是科技革命的直接产品。改革把预见、计划和及时实现社会变动作为自己的目标。这种变动是科技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

于是有能力实施这种改革（部门的、州的、区的、集体农庄和企业规模的）的领导者，（正是这种真正的领导者，而不是口头上的领导者）帮助现在正在进行的改变。

第三个问题：关于创造性地运用粮食税政策

最令人惊奇的是，粮食税和其他措施所产生的效果是那么的快。我父亲讲的一件事，使我一辈子都难以忘记。他是国内战争的参加者，曾经和部队一起被派去按余粮征集制向农民索要粮食。他奇迹般地从匪徒手中逃脱。而实行粮食税只有一年，我那生肺结核病的父亲又被送到那个村庄去养病，他对那里的变化感到吃惊、牛奶、蛋、面包很丰富，甚至还有肉。

其实，那时大家对经济取得这样快的效果都感到震惊。由于进行勇敢的改革，几年就在一个饥饿的和濒于破产的国家里安排好了粮食的正常供应。顺便说一下，那时农民自己已经在组织对他们有利的共同合作的联系，谁也没有强迫他们搞。列宁赞赏这一新的现象并预言它的伟大的未来。

当然，读者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论合作化》这篇著名的文章是从指出以下情况开始的：它，合作化在我们这儿将会得到完全特殊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如果国家政权在工人手里，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它，那么任务只能是居民的合作化。

这首先关系到农民。合作化对农民来说可能是转向新制度的一条更简单、容易和行得通的道路。

二十七大给党规定了在当代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粮食税政策的目标。为此必须首先抛弃

象行政手段和不等价交换等这类方法；第二，实现城乡之间向经济的、商业的和商品的关系转变，这是列宁所非常迫切需要达到的；第三，赋予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权，从而提高他们的物质鼓励和为最终结果的责任性，发展社会主义自治。

不久前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所作出的几个决议就是这种途径的范例。在这些决议里规定了在农工综合体中完善经济机制，大大扩大主动性，提高农庄和农场自主精神和为他们活动的结果负责的责任性的措施。生产队、组和使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合同期稳定化的家庭承包和包工制度将得到广泛的发展。

对家庭承包所抱的成见该抛弃了，这种承包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广为推行。在土地和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家庭承包是不比通常的合作社逊色的社会主义合法形式(顺便说一下，家庭承包通常是在合作社范围内采用的形式)。

第四个问题：关于城市合作社

我以为，我们对列宁关于合作社形式不仅可以和应该在农村运用，而且可以和应当在城市运用的思想的意义估计不足。“实在说，我们需要作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了解人人参加合作社的工作作好。‘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他强调“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再一次深思这些词句。“人人”是什么意思？那意思是真正地在城市里开展合作化运动。这是劳动人民大小团体的独立行动和自治的联合体形式(自然，在国家的监督之下)，为达到下列共同的目标：生产的、消费的、文化的、体育的、职业的、地方的、人口的和家庭的目标。

苏共二十七大的材料和决议在我们的科学和实践面前提出了一系列极重要的问题。

我们作出合作化事业已经完成的结论是否太早了呢？也许，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得以解决我们服务业的一些问题——在商业上的、生活服务方面的、汽车服务和在家庭支配下的其他技术？……顺便说一下，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里今天这方面做得比我们更广泛和更成功。还应当回忆苏共二十七次大上谈到的关于不适当地缩减手工业合作社。

我们已经在生活服务方面、在建筑业中开始实行合作化形式。组织和劳动刺激的集体形式、经济承包得到越来越广泛地运用。

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为了组织居民服务的良好体系，利用一切多样化的形式，不仅有国家的，而且有合作化形式，还有家庭和个人承包，我们只要足足二三年时间。自然，在这同时应当考虑的不仅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肯定的经验，而且还有那里所产生的困难和问题。

通常有几种不同意见来反对合作化运动。其中主要的一点是所谓落后理论特性。他们说，和国家的商店、食堂、工场相比较，合作社是倒退。谁能证明这一点呢？在什么书里能读到这一点呢？至少，马克思的书里没有，列宁的书里没有。而且，如果与此同时能更好地解决保证给劳动人民以良好的伙食、衣着和服务的任务，那怎么能说是“倒退”呢？列宁是在苏维埃政权还没有真正巩固的条件下搞合作化的，这样的转折今天还会引起什么危险呢？

但是有某些实实在在的不同意见，它们值得很大注意。第一，非劳动收入及其后果——

社会分化的增长。然而，遗憾的是，经验具有足够说服力地表明，就是国营形式也不可免。人所共知，非劳动收入，甚至国营服务行业中的非法财产蔓延极广。合作社有一定的优点：它的每一个参加者都关心保护和增加共同的财富。

第二个不同意见：担心生产领域的劳动力流到服务领域去，那儿的收入可能更高。这个问题是现实的，但是可以解决的。譬如，我们可以在这里更广泛地使用退休者，他们渴望自己的劳动得到某种使用。当然，存在对合作化进行财政监督的问题，但是累进税可以成为自然调节器（它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

当然，所有这些问题要求作认真仔细的研究，目的是找到一条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道路。

在我们这个时代合作化的思想是和当代工艺改革条件下劳动组织的新形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家里装配钟表、磁带录音机，将来还要借助于微型电子计算机工作。未来学家预言，再过二十——三十年，在工业发达国家里这种从主要中心调整出来的家庭劳动可能在总的劳动耗费平衡表里占据百分之二十左右。

第五个问题：关于始终一贯的经济核算

工业的结构改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复杂得多的问题。正如党的二十七大所指出的，这要求两个相互联系的因素同时发展：在实现党的经济战略基本目标方面提高集中领导的作用和坚决扩大联合体和企业的自主权以及扩大它们对最高的最终结果的责任性。

显然，当前还需要做的是在我们进行试验的基础上，考虑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还要研究西方国家管理的进步方法对制订和完善工业管理的改革。但现在有一点已经清楚了：需要全面运用列宁明确建立的原则——经济核算。国家，作为工厂的所有者，赋予企业集体以经济管理权并在自己的经济监督（在需要的范围内还有行政监督）之下运用这一所有权。

重读列宁关于在经济核算原则上改革工业体制的主张，很容易看到，经济实践还不总是和他介绍的那些模式完全适合（我们将不研究这是由于什么情况造成的——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

自然，经济核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自己的限度，因为所有企业过去是，而且始终是国家所有制。但是如果它们整个儿地，或者基本上“坐”在预算上；如果他们自己无法支配他们所有的产品，而是由其他什么组织来支配；如果所有物质消耗由上面来决定，那么列宁所理解的经济核算还剩下什么呢？那样的话，集体和每个工作人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它的结果的物质利益在哪儿呢？这里有给思考和试验的很大的领域，所以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了如此多样化的经验不是偶然的。

列宁确定了应当列入经济核算企业本身的那些东西。

正是企业站在我国经济机制一切改革的中心，这整个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劳动集体有效地工作创造条件。这要求能保证获利和所有企业没有亏损；广泛采用经济刺激；正确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全套工具；鼓励社会主义的进取精神；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

在我们工业企业工作中最尖锐的问题甚至不在于它们没有生产出许多高质量的商品，这是结果。而原因在另一方面，在于我们的企业不仅不抓住新技术、新工艺，而是相反，常常用一切办法把它们推出去。而如果是这样，它们就无法赶上居民需求的增长与变化。但是为

什么采用新技术、进行改造于它们没有好处呢？为什么要用强力、用行政的压力来强迫它们采用呢？有人建议在计划中就打下现代化的基础，当然，这能够部分地解决问题，但没有一个计划能够事前预见到整个技术进步，全部可能的发现。

那么需要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正象我们所知道的，还是列宁就作出了。不是由行政网所缠绕的虚伪的经济核算，而是真正的、完全的、对每个企业、每个工作人员来说，利益和损失都是由此而来的经济核算。任务也并不是简单地在于回到二十年代初所确立的经济核算上去，而是要考虑国民经济的巨大规模来扩大它、发展它。无疑，主要在巩固总的计划领导和来自国家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大小企业、轻重工业、地方和合作化工业的经济核算水平都不可能是一样的。

我们许多企业和联合体已经拥有按新方法经营业务的经验，但是这儿还不能说最后的话。与科技革命相适应的经济核算更有效的形式还有待于寻找和试验。

第六个问题：关于计划和商品——货币关系

看来，二十年代最令人惊奇的创造，这就是财政改革。上了年纪的人大概还记得革命以后最初年代的一支歌：“我跑到餐室去，没有一文钱，请兑换一千万！”改革是在世界上别的国家未必知道的骇人听闻的货币贬值的条件下进行的，它稳定了卢布，甚至保证了卢布与其他通货的交换。

在经济濒临彻底破坏的条件下怎么还能建立金卢布交换？秘密？但秘密是到揭破的时候了，目的是要学会克服看来无法克服的障碍。而可能，与其说是现实的障碍，不如说是成型的偏见。

党中央在向苏共二十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是克服关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偏见和在有计划领导经济的实践中轻视商品货币关系的时候了。不必隐瞒，许多学者——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迄今认为，仿佛象钱、商品、市场、利润、信贷都是过去时代的残余。仿佛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只是计划。

是的，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杠杆。这是原理。但是它和商品货币关系是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它们只是相互补充？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谁缺了谁都不可思议。因为只有把从收入和支出、效益和损失算起的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基础，以等价交换、根据生产费用而不是毫无根据地定价作为基础，计划才是真正经济的计划而不是行政命令。

钱是价值和生产耗费的测量仪。谁也没有更多地去想钱的替代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候我们不得不转到直接分配产品和商品，对这一“倒退”，退到商品前的经济的惩罚是经济关系的混乱。列宁非常清楚，而且经常强调这一点。然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偏见迄今没有被克服。要不然在我们的学者中哪儿来“商品者”和“反商品者”这种奇怪的划分呢；奇就奇在没有一个“商品者”想否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的意义，其实，就象没有一个“反商品者”否定商品货币关系一样。正在进行的争论是关于现实地存在于我们经济中的两种方法——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措施。

这儿有一些从实践来的尖锐问题。依我看，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关系到货币和商品之间组织联系的破坏，形成这样一种情况，许多企业和集体农庄有钱，居民也有钱，而商品不足。怎么回事？要知道，按常理，如果有钱，您就可以把钱投入您感兴趣的商品的生产和服务。但远不是总能这样办到的。

如何恢复货币和商品正常的相互关系，这就是我们财政制度发展的最重要的任务。为了解决这个任务需要采取在健全商品货币关系整个机制方面经过周密考虑的措施。研究列宁的财政改革可以对事业大有帮助。

第七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的利用

列宁仿佛预见到我们今天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展开争论和讨论，他提出了一个确切面又无可争辩的说法：“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前者将消失，后者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然而在科学界，还有许多搞实际工作的人，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形成了一个非常天真的观念，似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矛盾都是有害的，这些矛盾应当“消灭”但这就象（请原谅我作粗俗的比较）力图“消灭”男人和女人之间生理上的不同一样，无论前者还是后者，这意味着停止再生产……如果矛盾作为社会进步的火车头出现，一般说它们怎么可以消失呢？

主要问题——这是寻找与发展新要求相适应的矛盾方式的结合与相互作用的措施。政治艺术在于确定这个措施。

举个管理领域的例子。任何集体，甚至是最小的集体，不可避免地会有对某些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加入进来。怎么办？一个方法（行政的、专横霸道的）就是把与集体的领导者或同事们的意见不一致的那些观点（也许，还有这些观点的体现者）“砍掉”。另一个方法（理智的、民主的）则是使不同意见整体化，并在这些不同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更加有效的决定。这“更复杂”，但只有这样的途径才能在实践中证明有效。在苏共新的党纲中提出的自治思想要求首先发展劳动集体范围内的生产民主——扩大选举制、公开性、劳动者参加讨论和决定生产的迫切问题。我们大家应当习惯于在活跃的、矛盾的和竞争的社会里生活和工作，在这个社会里获胜的是积极性、对共同事业的忠诚、诚实的进取精神、革新活动和天才。提拔和鼓励人的整个制度（工资、奖金、职位、奖赏）就是应当鼓励工作人员的这些品质。也许，正是这成为改造我们意识的最困难的问题，正是在这些道路上我们将能够克服其中出现的疲塌、无动于衷和停滞的因素。

我认为，不太久之前震动我们哲学之家的围墙的关于矛盾的讨论，不完全在需要的方向上进行。他们争论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没有对抗，尽管列宁就已经对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他们争论关于“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矛盾，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揭示了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活动性质的规律。

依我看，真正的（理论的和特别实干的）问题完全在另一方面：如何利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矛盾作为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的源泉。经济改革和别的一些改革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辩证的观点来看，有根据的改革是对现阶段科技革命现实要求的合乎规律的回答。这是不断恢复和更新国民经济中血液循环的渠道的自然过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所确认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危机”或它的“停滞”的结果。可以说的只是这些改革的及时或延误，而改革本身是社会发展整个过程的必需因素。

问题在于把这样一些社会主义的在许多方面的矛盾因素更加成功地结合起来，象计划和商品货币关系、劳动措施和消费措施、社会公正和效益、社会平等原则和在劳动报酬方面的分化，职业技能和在领导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方面的自治。

我想特别强调真正的经济竞争机制的意义。列宁写到了关于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竞争，写到了在我们国家内部企业之间、在国家和合作社经济之间的竞争。

正象经验和某一活动领域的国家管理所表明的(在物质生产或在精神珍品中都是一样的),应当以单个的企业、合作社、科学中心、电影联合体、电视演播室、出版社、报纸、杂志真正的经济和精神竞争的机制得到补充。没有诚实的竞争和比赛(这种竞争和比赛不是妨碍,而是帮助合作和相互协助),任何活动领域都可能变成某种类似纹丝不动的林中(要不然就是沼泽地的)之湖。

看来,事情应当这样来提出,即要使每一个企业以最好的世界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产品。我们越是积极地国际与国内市场上与外国商品竞争,就越能使生产现代化和工艺进步成功地向前推进。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劳动者的福利和文化。要达到这一目的归根结蒂要依靠他本人的努力和生产劳动的本领以及利用科技进步的成就。现在的大转折战略——在列宁的思想和巨大的实践经验的试金石上调整的战略就是为人的这些品质的发展,就是为人的因素服务的。

(黄 石译自《文学报》1986年第16期)

苏共二十七大关于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

《消息报》1986年3月12日社论

党的二十七大的一个原则性和基本的决议是确定了国家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

应该着重指出,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某个已经确定的方针或是我们前进中的一个转折,而是**战略**,也就是未来长期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的综合性的、无数不包的纲领。就是这个纲领的战略性本质本身既为我们,也为我们下几代规定了它的意义。

正如戈尔巴乔夫所指出的,“在一切部门加速和彻底改造我们的生活,这不单是口号,而是我们党坚定和始终不渝遵循的方针”。

这一方针的名称用了一个今天作为标志、号召,作为哲学概念的词——**加速**。它的意义何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二十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防止了对这一概念作简单化的解释,这是意义重大的。要是遵照表面的认识,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谈到加速,就是说更快地做一切事情。果真如此吗?譬如说,更快地增加不需要的,长期堆放在仓库里的商品产量。这样做合理吗?为了加速建设速度,派遣大量超标准的建设者,造成这些人,与其说在做工作,还不如说在互相妨害,这样符合逻辑吗?由于缩短那些毫无用处的公文旅行的期限而获得的效益大吗?这样的“加速”早已过时。他们对今天党所提出的要求当然还不能适应。

无论经济是多么重要,也不能把加速纲领仅仅归结到经济这一个方面。确实,这个纲领最深刻地渗透在我国的经济中,然而,要活动的战线还要广阔得多,包括我们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规定要执行积极的社会政策和始终不渝地确立社会主义原则,规定要完善社会关系,革新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的工作形式和方法,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化。

加速这是夺取社会进步的新速度。这是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的“解决我们当前和长远的、经济和社会的、政治和思想的、内部和外部的、所有问题的关键”。

在组成我们发展的基础的经济方面提出的任务是提高增长速度，当然不只在常见的数量概念方面(更多的钢、燃料、动力、商品、食品、住房)，而且要在新的质量的基础上，通过尽可能的生产集约化提高增长速度、集约化的原则是少消耗、多生产。

经济加速的主要“动力”已明确确定。这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改造以及劳动的管理、组织、促进的有效形式。

本世纪末国家的生产潜力需要增加一倍，同时，在质量上对它进行改造以后，国民收入应成倍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一点三至一点五倍。换句话说，在今后十五年中，我们应比十月革命后的七十年所做的要多做一倍，顺便提一提，计算的期限已经开始。苏共纲领新的修订本和《基本方针》规定的社会和经济加速的主要目标既确定着当前工作的规模，也规定要进行革新。

代表大会的决议引导进行的正是革新工作，这点应特别强调。消极、停顿、保守和加速是水火不相容的。况且，根据社会发展的逻辑，只有在普遍革新、有主动精神、毫无夸张地说、以革命的方法对待事业的条件下加速才有可能。

无论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哪一个动力，每种动力都不单是打算，而且还要指出，任何劳动者工作中最迫切的需要是创造因素。要是我们着手深入改造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向高组织和高效率经济过渡，能不是这样吗？

以加速的这些最重要的工具——科学和技术为例。显然，科学技术本身不起作用，而是人们在使它们起作用。因此，但愿讲的是必须在科技进步的一切方面都作出根本性的革命进展，在代表大会上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这就是说，探索、主动精神和革新获得特殊的意义。为了把资金集中到科技发展的关键方面，为了大量使用可靠的、通过实践检验的、在最短时期内获得最大收益的技术革新成果，为了建立能多倍提高生产效率的新的技术和工艺，简言之，为了实行管理科技进步的既定战略、这些都是必需的。

党中央政治报告关于彻底改革经济管理，最认真地改造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必要性的论点贯穿着真正的革新精神。特别重要的是党代会明确规定了加速的经济杠杆，提出了任务，一方面提高集中领导经济的效率，另一方面是坚决扩大联合公司和企业的自主权的界限，提高它们对取得最好的最终成果的责任。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人民对二十七大决议的无数次的评论中，贯穿着一个思想：既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改造触及到所有的人，谁也不应该，也不能袖手旁观，只有大家每一个人都充满新内容的顽强的工作，才能保证革新的成功。事实上，党对彻底改革经济管理的原则指示要求规划机构、部和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重新认识和独出心裁地重新调整工作作风和方法，企业和联合公司有很大的自主权的方针，经济核算的加深、向自筹资金和自负盈亏的过渡，建立使生产集约化为不可缺少的经济条件，在国民经济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劳动集体，正在前所未有地提高主动性和社会主义进取性的作用。

这样就强有力地证实，在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中不能过高地估价人的因素的作用。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众所周知，经济机制的任何改造都是从思想意识的改造，摒弃思维和实践的固定模式、明确理解新的任务开始的”。

毫无疑问，这个论点不仅应该与完善经济机制过程进行比较，它还应贯穿在我们整个，用列宁的话讲，日常工作中，要是实行一种特殊的《育种》的话，那是天真和荒谬的：他们说，这件事与改革有关，所以应该按新的方法进行。但在这种情况下与改革毫无关系，可以

按老的办法去做。

在国民经济中实行深刻的改革的战略要求不少时间，而加速已经开始、已经在进行，所以我们的潜力使用得越好、首先是那些不要大量消耗，但能提供迅速和显著的效果的潜力使用得越好，加速的速度也就越快，在开始阶段尤其是这样。代表大会以前对文件的讨论和会上坦率、务实、原则性的讲话都表明这些潜力是非常大的。生产中的秩序、纪律、精力集中、当家人的指挥才干今天就已经能产生巨大的效益。

党代会拟定的加速的战略是明确的。明确在建设过程中目的和任务的明确程度有很大意义。在共产党员带头下的千千万万人的创新劳动一定会保证完成任务和达到目的。

(唐玉仙译)

个 人 意 见

叶·叶夫图申科

(按：为了贯彻苏共二十七大制定的“加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积极改造人们的社会意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因循守旧、冷漠无情、官僚主义以及其他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不良现象作斗争”的方针，《苏维埃文化报》于今年四月份新辟了一个“坦率的话”专栏，其目的是“让社会各界人士利用它来说说自己心里话，直截了当、毫无顾忌地对当前一些最重大、最尖锐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苏联当代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写的《个人意见》被选为这一新专栏的开端文章。——译者)

对于我们来说，“人民”、“人类”的概念首先是由个人构成的。但它们并不仅仅由著名的人物所构成，因为著名人物远非总是自己的人民和人类的优秀代表。

发表个人意见有时候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没有个人的公正意见就没有个性，而不存在具有个性的人们也就不存在人民。当个人意见能大胆地与胆小的、唯命是从的、丧失个性的意见背道而驰时，它就能成为人民的意见。当个人意见所包含的不是个人的贪欲，而是对人民利益的关心，它也能发展成为人民的意见。不敢公开发表的个人意见，具有一种自我破坏的作用。为了他人利益无畏地发表的个人意见，就能创造出个性。这样的个人意见不再是纯粹的个人意见，而成了一切他人的共同意见。当然，这只有在不是企图以自己的个人意见去压制一切他人的意见时才是如此。公开性的清风，意味着创作上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仅限于文艺方面，它体现了整个人民的创造——包括文艺创作——的自由。今天的这阵清风代表了个人可以发表的意见，也就是代表了民众的呼吸。然而为了使这阵清风不致于被文牍主义的夹子所钳制，就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丧失个性的现象。

在北方某个区的一个运动场上空，惹人注目地悬挂着一幅标语，上面不恰当地引用了涅克拉索夫的一句被曲解了的话：“你可以不当运动员，但一定要做个公民！”。在一些新楼房的模糊不清的墙上画了并且至今还画着一些极其难看的巨大的人物象，这些人物脸上带着一极不自然的朝气蓬勃而又乐观的神情，手里捧着大捆的麦穗或握着沉重的锤子。这样的

“鼓动”所能起到的最好的作用，那就是人们对它不加理睬；而它的最坏的作用就是使人们产生一种嘲笑怀疑的情绪，要不然就是恬不知耻的态度。该用认真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来代替粉饰现实的倾向了。这就是当前我们生活的主要趋向。有些善于词令的人把甜言密语、阿谀奉承偷偷混进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这样的态度，理应加以制止。那种对一些在起码的独立自主条件下可以在其它级别解决的问题死乞白赖地“向上”请示的做法，受到了公正而又强硬的劝告：“不要把什么都担在政府肩上”，应该自己解决问题。新时代令人鼓舞的象征，是提倡建设性的批评态度，谴责不必要的隆重性，发展民主的公开性。如果没有不受惩罚地发表个人意见的宝贵权利，那么公开性就不可能达到。

如果个人意见是错误的，那么可以而且应当用集体的意见来纠正它，但不能通过粗暴的行政手段去进行压制，而应当通过令人信服的同同志式的开导的方式。没有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也就不会有人民的共同意见。人民的意见——这不是“由上面”下达的通令，而是个人意见的综合。

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提倡过分地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而对其他人的作用则归结为可悲的“小小螺丝钉”的作用。仅仅根据某一个人——而且往往是并不内行的人——的意见，可以决定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也可以决定生物学、语言学、控制论、音乐、文学的发展。其他人的意见，甚至是那些本领域最内行的专家的意见，则受到冷遇，而且往往被作为似乎是与“人民的意见”相对立的意见而受到惩罚。由于只是把一个人的意见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主旨并且否定其它各种相当重要的意见，因而产生了不少错误。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为这些错误付出代价，那就是许多科学和生产部门还处于落后状况。这些令人痛心的错误当然未必都是由于恶意而产生的。在听取千百万人的意见——“应当怎么办？”之前，“应当这么办！”这样一种主观意志在道德上没有权利变为命令。

与农民、工人、赤卫军战士的接触以及和高尔基的谈话，对于列宁来说，并不是掩盖他早已决定了的意志行动的那种虚假民主。列宁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门向各式各样的民众的个人意见敞开了。只有这样敞开的大门，才是通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大门。列宁向我们的青年提出了极好的建议：“学习，学习，再学习……”。他本人不仅教育别人，而且自己也不断地向现实学习，敢于承认错误和改变原来的决定。列宁作出了历史上少有的职业政治家的榜样，因为他从来不把自己个人的意见置于最明智的谋士——现实——的意见之上。当外国记者们纠缠不休地问列宁“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吗？”时，他总是说，生活会作出回答。列宁的个人意见的力量就在于此——这种意见是原则性的，但又带有灵活性，成为生活本身的一种形式，而不是象削足适履那样，把生活硬套进那种一成不变的、僵化了的想法中去。在党内的原则争论中，列宁对错误意见决不容忍、不顾情面，但从行政上却采取宽容态度。他很尊重个人意见，甚至是当他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这种意见时也是如此。他还很重视对他的意见持反对态度的那些同志的良好品质。在进行批评的同时，列宁仍然让他们在能够表现这些良好品质的战争和建设岗位上工作。在国内战争中，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取得胜利，这是由于他们提出的“给人民和平！给农民土地！”的口号是建立在成为全体人民的意见的千百万个人意见的基础之上的。

在卫国战争最危急的时刻，斯大林的那份著名的告人民书的起首有些出人意料地带有人道主义色彩：“兄弟姐妹们！”——但就是这样的开头触动了千百万人的心。由于受到不应有

的损失和委屈，在这些心上还有多少创伤未曾愈合。“敌人一定被歼灭，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看法在当时不单单是一种个人的看法，而是全体人民的看法。把国家与人民的安危融为一体——这就是伟大胜利的秘诀。但是，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昨天的这些“兄弟姐妹们”的意见却变得似乎无关紧要了。假如当时问一下农民的个人意见，那么他们就可能说，不应该仅仅为了虚假地表示计划的完成而把育种的粮食也拿走，不应该把家畜全夺走，不应该根据那种文牍主义的劳动日制度来分配报酬，因为这些做法会使原来已经多灾多难的我国农业受到更大的损害。但当时却没有听听农民的意见。还有，假如当时问一问我们的读者、我们的音乐爱好者的个人意见，那么他们也可能说，不应该指责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非人民性，因为她在战争期间曾写过“我们的时钟敲响了英勇的时刻，勇敢精神久远不会离开我们”这样的诗句；也不应该批判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非人民性，因为他的列宁格勒交响曲对于全世界来说，成了我们祖国的精神不可战胜的象征。但当时也并没有听听他们的意见。

现在，在加速发展我国农业、提高我们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尽管还远远不够，阿赫玛托娃和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也被公开承认为我们苏联的经典作品，但我们难道有权忘记历史给予我们的惨痛教训吗？历史清楚地表明了，“上面下来的”意见与人民群众的意见相脱离是多么有害！然而这些惨痛的教训决不应把我们引向历史的虚无主义，抹煞我们的一切伟大胜利，——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年月我们在建设和军事方面所获得的胜利，都不应否定，新生的社会主义手头并没有一本按照它就可以自己进行建设的现成教科书。我们的社会主义——它本身就是这样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不能把其中载有英雄业绩的页张撕去，也不能把载有惨痛的损失和错误的页张撕去。不然的话，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后辈，都不可能按照这样的教科书进行学习。

今天，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区、州、共和国，担任领导工作的是一些富有创造精神的人，而这种创造精神，是在具体了解人民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实行科学和生产的集约化，但如果不强化个人意见的意义，不强化人民意见的意义，这些任务就不可能完成。我们已经开始进行并将继续进行的根本的经济改革，应该象列宁所说的那样，具有灵活的革命的求实精神，而如果缺乏崇高的精神境界，就不可能有这种精神。如果思维本身没有得到发展，那么要发展经济思维也就不可能。在精神上缺乏进行彻底改革的决心，胆小怕事，就不可能实现大胆的改革决定，因为胆小怕事只能为最宝贵的主动精神设置障碍。毫无疑问，我们的新领导想尽力帮助人民生活得更好些。但人民也应当以自己的劳动，以公开地、坦率地发表自己的个人意见的方式来帮助领导。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讽刺挖苦，而是为了共同事业，因而也就不应分什么“上面下来的”意见和“下面上来的”意见。有些“希望别出什么事的人”^① 恐吓我们说，畅所欲言会造成无政府状态。然而即使是在我们的国家刚成立时，在从各个方面遭到敌对的十四个强国的包围、内部也由于国内战争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列宁还是极其坦率、极其尖锐地抨击官僚主义和妄自尊大的作风，抨击投机分子和贪污分子，从而从社会主义的敌人那儿剥夺了利用我们本身的沉默的诱人机会。从朋友那儿听到的真话，是良药；而从不怀好意的人那儿听到的真话，是毒药。当前，我们的国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巩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更不应该害怕别人坦率地提出批评意见，因为这种坦率是我们成熟的象征，也是我们力量的标志，而磨平棱角——这却是虚弱的表现。“希望别出什么事

^① 源于契诃夫的小说《套中人》。——译者注。

的人”害怕“丢脸”，其结果往往就是丢脸。公众的沉默是无政府状态的一种隐蔽形式。没有什么比那种大家都顺从地参加表决，但不是出于内心和理智，而是出于习惯，形式主义地把手一举的现象更为有害了。这种形式主义的表决会发展成为对刚刚通过的决议的有意或无意的破坏行为。发表意见的公开性，当然不应该成为最终目的。公开性并不意味着要让那些无话可说的人也都要公开地大声疾呼。我们主张畅所欲言，并不是提倡信口开河地说些毫无意义的话，而是赞成坦率地发表那些能够变成行动的促进因素的见解。

在较短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在发展公开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公开发表的劳动群众来信以及关于党的代表会议或者关于生产会议的总结报告，开始使人感到读起来兴味盎然，它们与很多软弱无力、冒充文明的诗作相比，以布尔什维克的尖锐性博得了人们的好评。社会论坛的迅速发展有时会在公民应有的勇气方面超过我们的职业评论家。领导人员不仅批评自己机关的工作人员，而且往往还能大胆地进行自我批评，这样的自我批评我真希望从我们的一些从一个模子里刻出自己枯燥无味、毫无个性、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各种小说的作家口中听到。我们已经学会了对许多当前最为尖锐的问题——尽管不是所有的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对当前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的坦率程度，要超过我们对过去的看法的坦率程度。为了大胆地解决当前的问题，对自己的历史就不应胆怯地采取回避态度，因为在历史中也隐藏着当前一些问题产生的根源。

然而，在号召发扬公民应有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精神的背景下，还存在着不断地来自那些“希望别出什么事的人”的阻力。他们竭力使人们对许多历史现象和现实生活的观点失去差异，保持平衡和折中。这种错误地保存下来的不可救药的古代恐龙，千方百计地阻碍作家、导演、画家、科学家和工人们发表自己的个人意见。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把他们自己的个人意见置于其他一切人的意见之上。如果一个技术委员会对某种新式飞机的构造肆意作出否定的决议，而飞机仍然冲破了决议的阻力被制造出来并为了祖国的荣誉飞向了蓝天，那么这样的技术委员会就不能不受到社会和道德的谴责。应该作出这样的规定了：有些人曾经走上过重要发明的道路，但他们却阻碍一些文学作品的发表、戏剧的演出、电影的放映和图画展出，而这些作品以后却获得公众普遍的赞扬，那么这样的人就应该被认为是不够当领导的资格的。

当我的长诗《被拿掉的棋子》被禁止发表的时候，一位在前线打过仗的作家和其他一些作家坚决支持我的这首长诗。当时他对我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同志式的话：“我当然对某些历史事实并不这样看……但我们两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因为这是对祖国的共同的爱的基础。为此，我应当维护你的权利，而你也应当维护我的权利……”。这些话真是说得不能再实际，也不能再质朴了。这种观念不仅应当成为我们出版界实际工作中的基本观念，也应当成为民主地发展各方面的公开性这一工作中的基本观念。

为了把人类从核灾难中拯救出来而在国际讲坛上发表讲话的苏联领导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颂词，而是反映千百万人民群众意见的实事求是而又充满朝气的讲话的各阶层代表；不按会议预定的计划而要求发言并且当着不自在地耸动双肩的领导者的面毫不留情地说出工人的真心话的钳工；对悄悄地塞给自己的小纸条置之不顾而从一个农民的多灾多难的内心深处吐露出每一句话的女挤奶员；对压制先进思想的那种伪科学的观念进行原则性斗争的科学家；从俄罗斯联邦文学创作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对北方一些河流的命运表示深深的忧虑的作家，——我们所有的人在历史面前都是平等的，而且都对历史负有责任，我